

操纵译者与译者操纵

彭浩

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武汉

摘要 | 20世纪中后期, 西方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翻译研究的方向发生了转变。它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模式而上升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思维模式。勒菲弗尔的“翻译三要素”理论为翻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观点。按照勒菲弗尔的观点, 译者主要受到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纵; 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不是只受到操纵, 译者同时也是操纵者, 他不但操纵着原文, 也操纵着译文。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要在众多因素中寻求一种妥协。每一部译作都是译者所维系的一种最大动态妥协, 译作的产生便是这种最大动态妥协的体现。翻译也是一种斗争, 斗争当中有妥协, 妥协当中又不断地斗争, 在这一斗一协的过程中, 才能使翻译不断日臻完善。

关键词 | 译者; 操纵; 最大动态妥协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近期, 翻译界越来越重视对翻译主体性的研究,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 不同侧面对翻译主体进行了多维研究。从研究结果看(许钧, 2003: 11), 对“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 大致有四种答案: “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 二是认为原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 三是认为译者和读者是翻译主体, 四认为原作者, 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主体。”尽管说法不一, 有一点理论界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那就是都认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翻译是一个译者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斡旋过程, 是一个译者进行选择 and 决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 充分发挥着其主观能动性, 操纵着译语文本。翻译是过程, 也是结果。“从

译入语文学观点来看, 所有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语文本的操纵”(Hermans, 1985: 11)。可见, 译者既操纵着原语文本, 又操纵着译语文本。

二、操纵译者

翻译也就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因素的操纵, 译者在文本转换过程中受到限制或是操纵(Bassnett, 1998: 95), 可以说操纵是翻译永恒的主题。安德烈·勒菲弗尔(Lefevere, 1992: 12)认为翻译始终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 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

(一) 诗学

各个国家文化不同, 审美情趣不同, 也就必然导致诗学观的不同。按照勒菲弗尔的定义, 诗学观

可以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二是文学的会角色。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本国的诗学观在译者脑海中已经根深蒂固，其翻译也就不可避免受到自己本国诗学观的影响。因此，“译者通常按照自己文化的诗学观来造原作的诗学观，这样才能保证译作有读者”（Lefevere, 1992: 27）。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通过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发现，西方翻译史主要是目的语为归宿的研究倾向。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他首先援引诺曼·夏皮罗的话来说明西方翻译史所追求的主线是者在译文中的“不可见性”。

“我认为，译文应该力求透明，以至看起来不像是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气泡。当然，理想的最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在读译作。”（Venuti, 1995: 10-11）

紧接着，韦努蒂指出“隐身”主要指两种相互支配的现象，一是作者对英语的“操纵”。即作者在书写译文时所遵的是“通顺、透明”的诗学规则，二是阅读和评判译文的标准也是“通顺、透明”的诗学规则（Venuti, 1995: 12）。韦努蒂认为有些译文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商业角度都非常成功，有译文只是昙花一现，还有些译文根本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但无论译文怎样，评判他们的标准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通顺”。“通顺”规则从社会规范上影响着译者：我们出生在一定的社会，必然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翻译不仅仅是文体的选择，还要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译者要想图生存，往往顺应潮流，谋求发展。比如，林纾的古体译文可以说既通顺又悦耳，是吸引读者的“糖丸”，同时也是他的“造币厂”。尤其在《撒克逊劫后英雄》（今译《艾凡赫》，沃尔特·司各特）中，他将 Lady 译成了“列底”，并且非常贴心地在后面附上了一个注：“尊闺门之称也”，这种赶时髦译新词的文风让他声名鹊起。虽然韦努蒂提倡“抵抗式”翻译，但他也充分意识到不通顺的翻译往往难以出版，出版了也往饱受诟病。译者一方面受到译语诗学规则的操纵，另一方也受到原语诗学规则的限制。译者在原语诗学规则和译文化诗学规则之间的妥协充分揭示了文化适应和诗学权力程度（Lefevere, 1992: 27）。

（二）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按照勒菲弗尔的解释，指的是社会

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意识形态像一张无的网罩在译者的头上，无时不刻不在操纵着译者。翻译不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译者在特定时间、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活动。他们如何理解自身及自身所处文化决定着他们如何从事翻译。首先，意识形态决定着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不会允许叛逆当时社会规范和社会潮流的翻译对象。即使是创作，也同样要顺应社会的意识形态，否则，译作便通不过审查制度的审核，译者也会前功尽弃。意识形态也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即如何译的问题。在原文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译者视“忠实”为“天职”，任何“不忠”的译文都会遭到世人的口诛笔伐。意识形态还决定了译作的接受程度。

例如，“千方百计”这一汉语成语，其汉英词典的对应解释是：in a thousand and one ways; by every possible means; by hook and by crook。但这些翻译并不能因地制宜，因此要视不同情况运用。

再如，“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毛泽东选集》

译文：At that time we called for sumounting the difficulties by a thousand ways and a hundred devices. ”

又如，“这些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请好大夫配药诊治。”——《红楼梦》

译文：Their ladyships are doing all they can to find good doctors to diagnose your illness and prescribe medicine.

显然，此处“千方百计”在词典中的翻译就觉得很不得体，无法顺应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事实上，翻译从来都和意识形态，权利关系紧密相连的。

（三）赞助人

当然，意识形态力量的实施是通过赞助人来实现的。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不一定非得是个体的人，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译者受到最大的操纵力量来自于赞助人。如果译者想出版自己的作品，他们一般只能对赞助人言听计从。宗教集团对译者有极大的操纵力。英国作家拉什迪的作品《撒旦诗篇》，被宗教集团认为是亵渎伊斯兰教神灵，因而遭到封杀，而那些试图把它翻译成外文的译者也招来了杀身之祸。因此，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译，什么不可以译，直接受到宗教势力的影响。政府部门主要通过审查制度来操纵译者，而译者要想出版译作，要在方方面面受到出版社的操纵。从选题，到翻译，到出版，所有环节都收

到出版社的制约。韦努蒂提供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标准译作出版合同：

你和我们达成一致：你所从事的翻译是我们特别购买版权而且委托你来进行的。你在受雇从事翻译时应该按照版权公约约定的规则进行。按照版权公约，我们在全世界独家享有所有版权，你不能通过个人或者任何代表你的代理人声称享有版权。

(Venuti, 1995: 10)

由此可见，出版社不仅在各个环节上操纵着译者，还剥了他的版权享有权，译者只不过是他们所雇用的“译匠”而已。

除了出版社以外，读者也是操纵译者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对读者作用的重视起源于接受理论。接受理论或接受学兴起于二十世纪，最早脱胎于阐释学。传统的阐释学以作者为中心，不考虑文学作品的产生条件和读者的感受，只研究品本文的“内在的”阅读，阐释的目的是要回到作者本意为理想目标。因此它要求解释者超越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以期达到完全不带主观成分的透明的理解。在阅读过程中，原文本的主旨和主题意义可能会因不同的阐释者而有所分别。接受美学大师姚斯认为：“过去人们将文学作品的存在看作先于读者接受的已然客体，它只与作者的创造有关，作者是作品存在的根源，读者是被动接受一件存在于那里的东西，他与作品的存在无关。”从接受美学来看，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应该是接受美学意义的读者，这种读者实质上参与了作品的存在，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存在。鉴于此，读者的期待视和审美经验就不可避免地操纵着译者，无视读者的操纵作用就是无视译作的生命。

总之，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等因素在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操纵着译者。可以说特定文化中的文学文本的研究都可视为对操纵的研究。从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因素看作为“专家”的“重写者”——批评家、翻译家、选集编纂者、学工作者、教师——操纵着相关的知识话语。他们通过社会机构的准许，如授予学位、出版书籍和文章、邀请参加学术会议在学校和一些学术团体的任命控制着特定领域的话语权，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与社会权力机构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文学应该怎样，这是诗学话题，但诗学的社会功能与意识形态相关，甚至是意识形态决定的。译者所有的选择都与权力（不是狭义的“政权”而是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相关，译者的重写或操纵实质上是意

识形态赋予他的权力。

三、译者操纵

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在意识形态赋予的权力范围内，发挥着其主观能动性，操纵着原文和译文。

（一）译者对原文的操纵

翻译的前提是理解，王宗炎教授就曾经提出“辨义是译之本”。但是在翻译研究中，对于“理解”也同样有不同理解。传统翻译观认为原文有唯一正确的意义，而翻译的任务就是在译文中去重现或复制那唯一正确的意思。现代阐释学则认为，理解具有历史性。所谓历史性，主要指读者所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和制约读者对文本的看法（涂纪亮，1996: 405）。所以，原文的意思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译者本对原文的一种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即阐释者。比如伽达·默尔认为，“对一种文本的翻译不可能只是再现作者头脑中原来发生的事件，而是按照译者理解文本中的叙述方式重新创造文本。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对其读者来说现出一种新的外貌，认为译文应当忠实于原文的要求并不能填平两种语言之间的鸿沟。译者经常痛苦地察觉到他与原文之间不可避免的距离，他处理文本的翻译与他在谈话中理解对方而做的努力大致相同。正如一个人在谈话中力图进入对方的内心以便了解他的想法一样，译者也力图进入文本作者的内心以便了解文本的含义。译者既要尊重他要译成的本国语言的特性，也要尊重文本及其所使用的语言的特性”（涂纪亮，1996: 420）。由此可见，由于作者自身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译者的理解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误读”过程。误读也许是无意识的，即由于读者自身的素质问题造成的误读。而我们在本文中谈到的误读是指有意识的误读。这种读来源于外部人文环境和文化环境。译者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意对原文误读，通过操纵原文，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误读通过增删原文和文化过滤等手段达到操纵原文，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以说是中国翻译活动的一个新高峰，亦是文学作品首次成为翻译活动重心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译却并不以“文学”为目标；促成文学翻译兴盛的原因亦非文学本身，而是当时中国社会对变革的需求。满清政府积贫积弱，外强虎视眈眈，乃求变的根由；而

变革的目的乃自强救国。19世纪中叶以“西学为用”翻译活动集中于科学、法律、历史、经济等方面，到了19世纪末，文人志士提出救国必先强民的看法，要教育群众，实行根本的改革，而他们提倡的教育工具，正是小说。在小说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最常用的策略是删节。当时的译者是文化中介人，利用他们的专长，在社会上实践教育民众的任务，因此裁剪作品以适应读者的需要，不但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除了删减原文外，更任意发挥，在译文中加入大段的个人创作，性质全部是针砭时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译者是通过阅读原文文本操纵，达到其以通俗小说作为教化工具的目的。傅东华在翻译《飘》时，把大段的心理描写部分进行删节，就是为了增加中国读者的阅读趣味。阿富汗人对高尔基的《可汗和他的儿子》中东方面色彩的内容特别喜欢，并在第二个译本的结尾处增加了一些内容。原作的结尾很简洁，译文却在翻译时却增添了两段。译者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同阿富汗文学的说教传统一致。译者对原文的操也就是翻译的目的论。奈达为了传播上帝的话语，把语言当标签，按需调整话语，充分反映了其操纵文本服务于宗教信仰的目的。

（二）译者对译文的操纵

译文是译者的产品，译者直接操纵着译文。同样的原文，由于译者不同，译文差异也就很大，这正体现着译者在操作过程的操纵作用。译者对译文的操纵作用主要体现在译文的翻译策略上。早在1813年，施莱尔·马赫就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韦努蒂提出两种翻译策略，即归化的翻译和异化的翻译。归化的翻译强调译文的通顺和透明，以至于看起来不像译文。归化的翻译对在本国文化中传播外国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正解构主义者认为的那样，翻译是求同的过程，也是存异的过程。翻译就像修补打碎了的花瓶，不是去寻找相同的碎片，而是去寻找能够相互吻合的碎片。韦努蒂将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付诸实践，提出了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策略。韦努蒂在其力作《译者的隐身》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译文中应该看得见译者，以抵御和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他把这种异化的翻译方式称为“抵抗式”翻译。应该

说，韦努蒂的这种“抵抗式”翻译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他把归化的翻译与异化的翻译不仅仅看作是翻译的原则和方法问题，而是像翻译研究派一样，结合政治、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并指出翻译的透明性是通过通顺的翻译策略，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归化的翻译来实现的。红色在中国是吉祥的色彩，象征着喜庆欢乐，带有褒义色彩，但译为英语时，此类的红色基本不可译为“red”。如：红白喜事（of happy occasions）；开门红（get off to a good start）；红豆（love pea）；红利（dividend）；红头文件（official document）等。英语中，“red”被引申为“残忍、灾难、狂热”等，英译时无法找到对等词；再如，catch sb. red handed（当场抓获）；red tape（官僚作风）等，这些都是译者运用翻译策略对文本操纵的结果。在英美文化中，实际上是以英美文化的规范、价值观和美学观为标准来归化外国文本和异域文化，表现了英美的民族中心主义。韦努蒂批判了这种文化霸权主义倾向，并对此进行挑战，提出了“抵抗式”翻译的策略，以英美文化中表现处于边缘地位的外国文化，即要为外国文化在英美文化中争得独立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译者可以通过操纵文本，进行文化上的抗争。

四、结语

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译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学识、经验，在取舍中做出选择。我们这个时代，个体的每一个举措都是被注视的，他不是服从就是颠覆，或者服从中带有颠覆，这种策略上的选择最终还是受制于特定社会的文化。文化霸权和文化操纵确实存在。翻译是受到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影响制约形成的。译者是妥协的艺术家，译文不仅要向所处时代的诗学形态、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等外部因素妥协，同时也要向译者本身的翻译观，翻译意图和读者对象等内部因素妥协。

鲁迅作为一个译者的身份，也进行了上述的妥协，无论是妥协晚清的意译风尚，还是向梁启超所提倡的“政治小说”的意识形态妥协，以及针对瞿秋白的“语文改革”，调整了翻译策略。同时他也根据自己的翻译意图和读者对象，做出了妥协。事实上，每一部译作都是译者所维系的一种最大动态妥协：译者处于原文与译文、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两极，始终在操纵与被操纵着，译者时时刻刻都在试图找出支两极力量的支点，使两股力量达到平

衡。平衡之时便是理想译作产生之际。翻译就是在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妥协，同时也要使译作充满艺术性。翻译就是妥协，翻译就是斗争，斗争当中有妥协，妥协当中又不断地斗争，在这一斗一协的过程中，才能使翻译不断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usan.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 [2]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 [3] Hermans Theo.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 [4]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C]. London: Routledge, 1992.
- [5] Lefevere Andre. *Transi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6]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 [7] 崔永禄. 翻译的斡旋过程及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2): 1-4.
- [8] 葛校琴. 译者主体的枷锁——从原语文本到译语文化 [J]. 外语研究, 2002 (1): 62-65.
- [9] 郭建中. 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 [J]. 中国翻译, 2000 (1): 49-52.
- [10] 金圣华. 认识翻译真面目 [M].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2.
- [11] 涂纪亮.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一卷)——语言哲学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12] 屠国元. 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的阐释 [J]. 中国翻译, 2003 (6).
- [13] 许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J]. 中国翻译, 2003 (1): 8-13.
- [14] 谢天振. 译介学 [M].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15] 杨仕章. 文化翻译观: 翻译诸悖论之统一 [J]. 外语学刊, 2002 (4): 68-72.
- [16]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七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Manipulated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ors' Manipulation

Peng 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20th century,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ed with diversified trends, and there was a shift in the translation research,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linguistic model and became a cultural mind-set. Lefevere's translation theo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viewpoint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which refers to that translators are mainly manipulated by poetics, ideology and patronage; however, translators are not only manipulat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y are also manipulators to control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text as well. The task of translators is to seek a compromise among the many factors. Every translation work is the maximum dynamic compromise and embodiment of such compromise. Translation is also a struggle. There must be a compromise in the struggle, and there is constant struggle in the compromise. In the process of this struggle and compromise, translation can be continuously perfected.

Key words: Translator; Manipulate; The maximum dynamic compromise